

传统蒙学教育教学方法现代性转化的理论逻辑

The theoretical logic of the modern transformation of Traditional elementary education teaching methods

蒋尊国¹

JIANG ZUNGUO

华侨崇圣大学、中国学学院

College of Chinese Studies, Huachiew Chalermparakiet University

E-mail: 160106204@qq.com

陈恩维²

CHEN ENWEI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中国语言文化学院教授

Professor in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P. R. China

E-mail: 410715182@qq.com

Received: 10 October 2023 / Revised: 12 December 2023 / Accepted: 14 December 2023

摘要

研究目的：传统蒙学教育是中国传统教育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其中蕴含的教学方法进行现代性转化，有助于推进当代语文教育和国际中文教育教学。本文拟深度挖掘传统蒙学教育的教学过程与特点，归纳总结传统蒙学教育中宜于进行现代性转化的教学方法。研究结果：传统蒙学教育中宜于进行现代性转化的教学方法包括：在教材内容上，考虑到儿童对未知世界的探索，涉及内容广泛，贴近日常生活、易于儿童具体感知；在教学语言上，考虑到儿童语言习得的规律，巧妙安排语音押韵与词语组合，建立语音词义的联想链接；在教材形式上，考虑到儿童从具体到抽象的认知特点，引经据典引入故事，增强趣味性，在正文中加入插图，既直观形象又吸引儿童兴趣；在学习顺序上，考虑到儿童由简入繁的思维发展规律，识写分开，先集中识字、简单习字，写作训练以属对为先、寓教于乐。

关键词：传统蒙学教育；教学方法；语文教育；现代性转化



ABSTRACT

Research objective: Traditional elementary education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education. The modern transformation of its teaching methods will help promote contemporary Chinese education and international Chinese education and teaching. This article intends to deeply explore the teaching proces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raditional elementary education, and summarize the teaching methods that are suitable for modernity transformation in traditional elementary education. Research findings: Teaching methods worthy of modern transformation in traditional elementary school education include: in terms of teaching material content, taking into account children's exploration of the unknown world, covering a wide range of content, close to daily life, and easy for children to concretely perceive; in terms of teaching language, taking into account children's language Acquisition rules, cleverly arrange pronunciation rhymes and word combinations, and establish associative links between pronunciation and word meaning; in the form of teaching materials, taking into account children's cognitive characteristics from concrete to abstract, quotes from classics and stories are introduced to enhance interest, and illustrations are added to the text. , both intuitive and attractive to children; in the learning sequence, taking into account children's thinking development rules from simple to complex, literacy and writing are separated, focusing on literacy and simple calligraphy first, and writing training is based on genus pairs first and is entertaining.

Keywords: Traditional elementary education, teaching method, Chinese education, The modern transformation

绪论

传统蒙学教育是中国传统教育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历朝历代都意识到对儿童进行启蒙教育具有重要意义，《易经·蒙卦·彖辞》载：“蒙以养正，圣功也。”明代霍晦在《家训》中提出：“家之兴，由弟子多贤；弟子多贤，由乎蒙养；蒙养以正，岂曰保家，亦以作圣。”古代蒙学教材在《四库全书》等传统目录著作中一般归入经部小学类字书之属蒙学门，在教育教学中，传统蒙学教育主要为学童提供认字识词、作对造句、道德启蒙、习惯培养、语言积累、知识扩展等教育内容。

一、研究背景和意义

(一) 研究背景

“蒙”有幼稚和暗昧两重意义,《易经·序卦》载“蒙者,蒙止,物之稚也。”“童蒙”取自于《易经·蒙卦》:“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幼童于事多暗昧,因此称之为童蒙。启蒙童稚,消除暗昧称之为启蒙,是启蒙教育的目的。对“蒙学”的概念,目前存在三种理解:一是我国古代对儿童开展启蒙教育的教育机构,如《辞海》:“蒙学,亦称蒙馆,中国封建时代对儿童进行启蒙教育的学校。”启蒙教育旧时在书馆、乡学、村学、家塾、冬学、义学、社学等各种不同机构进行,所有这些教育机构统称为“蒙学”。二是我国古代对儿童所进行的启蒙教育,如《辞源》中释义为“启蒙之学,犹今之小学。”注云:“童蒙之来求我,欲决所惑也。”瞿菊农(1961)提出:“过去的教育家们,采取了易经上“蒙以养正,圣功也”的主张,将“小学”阶段的教育,称为蒙养的阶段。”^[1]徐梓(2007)提出:“蒙学是一个特定层次的教育,是特指我国古代儿童所进行的启蒙教育,相当于现在的小学,其中包括教育的目的、教育的内容、教学的方法等多方面的内容”^[2]。三是对我国古代对儿童开展启蒙教育时所用的教材,河边(2007)认为:“蒙学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上讲,泛指古代启蒙教育,包括教育体制、教学方法、教材等内容;狭义上讲,专指启蒙教材,即蒙学文献”^[3]。本文中的“蒙学”采纳以上第二种理解,主要是指我国古代面向儿童的启蒙教育,属广义上的蒙学,接受蒙学教育的儿童年龄阶段大概在七八岁到十四五岁之间(汉书艺文志载:“古者八岁入小学。”旧时使用虚岁,八岁即为当今七周岁)。

中国古代的学校教育自夏朝舜帝时期已有雏形,在舜帝时期,设置司徒、秩宗、典乐为最早的教育官,主伦理、音乐。夏代的上庠、下庠、东序、西序,商代的右学、左学,这些都是贵族子弟集中就学的教育机构和就学场所,学习的内容主要是礼、舞、乐、武、射等,但是没有统一规范的书面教材。学校书面教材传播知识的重要载体是文字,自上古伏羲画出八卦,发明数字“一”,仓颉随后造出了“戊己甲乙、居首共友、所至列世、式气光明、左互从家、受赤水尊、戈干斧蒂”28字。到了西周时期,约公元前7世纪至前8世纪,周宣王时的太史以大篆编成我国最早一部字书《史籀篇》,即是中国历史上记载最早的儿童识字教材。《史籀篇》为四言韵语,共十五篇,其编纂施行,是历史上第一次系统的文字整理与规范,也是文字教育和书写训练有了固定范本的开端,推动了中国古代教育的规范化、标准化进程。《史籀篇》是第一次“书同文”的产物,第二次大规模的“书同文”出现在秦始皇时期,文字的统一为蒙学教育的规范与兴盛奠定了基础。随着教育的发展,“大学”阶段主要是官办,如太学、国子学及州郡之学;开蒙以至全部小学阶段,大都依靠地方乡村或私人和私学设立的“蒙学”进行教学,如乡学、村学、小学、书馆、家塾、私塾、冬学、义学、社学等。结合蒙学教材,蒙学教育大致经历了四个时期:

1. 周秦汉至南北朝时期。蒙学教育处于起步阶段,主要目的是为识字辨物,蒙学教材有《史籀篇》、战国管仲《弟子职》、秦朝李斯《苍颉篇》、赵高《爰历篇》、胡毋敬《博学篇》等;到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儒学经典成为教育的主要教学内容,在蒙学教材中也开始融入了儒学理念。此时期蒙学教材有西汉司马相如《凡将篇》、史游《急就篇》、李长《元尚篇》、扬雄

《训纂篇》，东汉贾鲋《滂喜篇》，梁周兴嗣《千字文》等。

2. 隋唐至五代十国时期。隋朝建立了用来选拔官员的科举考试制度，历经唐朝、五代十国到宋朝后，科举制臻于完善，随后蒙学教育体现出为科举考试服务的趋势，如唐李翰《蒙求》、马氏《开蒙要训》、姜公辅《太公家教》、杜嗣先《兔园册》等。

3. 宋至明时期。宋朝蒙学教育蓬勃发展，北宋苏轼在《谢范舍人书》中说当时“释耒耜而执笔砚者，十室而九”；南宋王象之《舆地纪胜》记录宋代福建南剑州农村“家乐教子，五步一塾，十步一庠，朝诵暮弦，洋洋盈耳”；南宋耐得翁《都城纪胜》载“都城内外，有文武两学，宗学、京学、县学之外，其余乡校、家塾、舍观、书会，每一里巷须一二所。弘诵之声，往往相闻。”同时宋明理学兴起，性理、道统观念通过蒙学教材向儿童传播。此期间蒙学教材也日益丰富，仅宋代就新编蒙学读物 65 种（北宋 11、南宋 54），出现了北宋佚名《百家姓》、王令《十七史蒙求》，南宋王应麟（一说为区适子）《三字经》、朱熹《小学》和《训蒙诗百首》、程若庸《性理字训》、吕本中《童蒙训》、胡寅《叙古千文》、徐子光《补注蒙求》、吕祖谦《少仪外传》、陈淳《小学诗礼》、方逢辰《名物蒙求》、谢枋得《千家诗》，元许衡《小学大义》、虞韶《日记故事》、郭居敬《二十四孝故事》，明程登吉《幼学琼林》、佚名《增广贤文》、吕得胜和吕坤《小儿语》《续小儿语》等。为更生动形象便于理解，且吸引学童兴趣，明代出现了带插图的蒙学教材，如佚名《新编对相四言》、焦竑《养正图解》、陶赞廷《蒙养图说》、涂时相《养蒙图说》等。

4. 清朝时期。对前人蒙学教材进行增补，也编纂了一些新的蒙学读物，包括有如何开展蒙学教育的指导性内容，同时为巩固统治，蒙学教材中也融入了更多的伦理要素。出现了孙洙《唐诗三百首》、崔学古《幼训》、李毓秀《弟子规》，明萧良有（编）清杨臣诤（增订）《龙文鞭影》、张履祥《初学备忘》、石天基《训蒙辑要》、王筠《教童子法》等蒙学教材。清末颁布《钦定学堂章程》之后，国内教育逐步借鉴国外实行分科，1905 年废除科举制，蒙学教育日渐式微。

（二）研究意义

本文的研究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有助于推动当代语文教育守正创新、蓬勃发展。从传统蒙学教育到当代语文教育，我们一直在探索一条适合中国语文教育发展的路。清末，西学东渐，参照外国的做法实行分科教学，有些学科像生物、博物、物理、化学等是从外国引进的学科，但语文学科是中国人自古以来就存在的学科。传统蒙学教育在上千年的历史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全面梳理蒙学教材内容等基本情况，深度挖掘传统蒙学教育具体实施的顺序、步骤、过程、规律与特点，分析传统蒙学教育课堂的教学过程与教学方法，能对蒙学教育有较全面较清晰的认识，从而厘清传统蒙学教育的教学规律与特点，立足当代语文教育的思维，为当代语文教育提供借鉴参考，提出适应当代语文教育教学需求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建议，推动当代语文教育守正创新、蓬勃发展。

2. 有助于发挥传统蒙学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与振兴中的价值。纵观古今，放眼全球，世界文明历史久远，但是唯有中华文明五千年来不曾中断、延绵不绝、生生不息，教育在其中发

挥了重要作用，其中蒙学教育就是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蒙学教育承担着启发心智、传播知识、传承文化、道德教化等功能，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同时，相对于名家名士圣贤经典而言，蒙学读物记载、反映与传承的是民众日常生活和文化。徐梓（2017）提出，“作为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这些旧时教育小孩子们的道理，这些直到现在仍然被一些人认为不值得研究的‘浅陋、鄙俚’的童蒙读物，比起那些‘羽翼经训、垂范方来’的所谓‘不朽之作’来，就体现中国传统文化这一点来说，并没有丝毫的逊色，反而更加典型、充分和鲜明。即使比起那些堂皇的儒家经典，也更加真实、更加具体。”^[2]研究传统蒙学的教育教学方法，有益于理解中国传统文化中更接近日常生活之处，更好地传承与振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3. 有助于推进国际中文教育教学。中国传统蒙学教材在文化传播上扮演着重要角色，随着文化交流传入了东亚的日本、韩国，东南亚的泰国、越南，欧洲的俄国、意大利等，蒙学经典被奉为外国人学习汉字、汉语、汉文化的宝典，不断出现转抄、翻刻、注释、改编与仿作。参考外国儿童和传教士借助蒙学教材与方法学习中文等成功经验，结合近年在国外对华裔与外国儿童开展蒙学经典教学实践探索，研究蒙学教育教学方法的优势，并进行现代性转化，提出将传统蒙学运用于国际中文教育教学，有助于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

二、研究范围、目的、主要内容、方法和创新性

（一）研究范围

本文以中国传统蒙学教育的教学方法为研究范围，主要以《急就篇》、《千字文》、《三字经》、《百家姓》、《弟子规》、《增广贤文》、《幼学琼林》、《龙文鞭影》、《千家诗》、《蒙养图说》《笠翁对韵》等传统蒙书经典为典型案例进行深入剖析。

（二）研究目的

传统蒙学教育是中国传统教育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其中蕴含的教学方法进行现代性转化，有助于推进当代语文教育和国际中文教育教学。本文拟深度挖掘传统蒙学教育的教学过程与特点，归纳总结传统蒙学教育中宜于进行现代性转化的教学方法。在此基础上，提出适应当代语文教育需求的发展建议。

（三）研究主要内容

本文梳理了与传统蒙学教育相关的国内外研究情况，深度挖掘传统蒙学教育的教学过程与特点，归纳总结传统蒙学教育中宜于进行现代性转化的教学方法，提出建议在教材内容、教学语言、教材形式、教学顺序等方面进行现代性转化。

(四) 研究方法

1. **文献研究法。**通过实地查阅华侨崇圣大学图书馆和广东省佛山市图书馆、佛山科学技术学院图书馆等实体图书馆，线上查阅中国知网、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维普智立方知识发现系统等文献数据库，搜集整理相关的现有研究文献，提供充实的理论支撑。

2. **实证研究法。**联系传统蒙学教材在中小学教育中的运用情况，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将研究过程中提出的对策建议做法，运用于教学实践进行检验，形成科学可行的规律和特点总结。

3.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语言学、古代文学、教育学、统计学等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本文进行综合研究，从多角度、多视角进行观照，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

(五) 研究创新性

1. **立足于借鉴传统蒙学教育经验解决当前中小学语文教育的痛点来研究。**经过多年深化发展，当前我国中小学语文教育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总体上看，仍存在一些薄弱环节。一是过于强调语文学科的学习。语文学科在高考、中考中都是最主要的科目，考试是评价的主要手段，成绩不仅是评价学生学习质量的主要标准，也是评价老师教学能力和教学效果的主要标准，从而忽略了对学生的素质教育，忽视了学生们的兴趣爱好，造成学生的思路难以打开，无法开拓视野，从小就形成了死记硬背的学习方式，加上采用题海战术，不仅造成学生课业负担过重，而且压抑了学生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的发挥。二是忽略语文课程与其它课程的关联性。众所周知，课程与课程之间有着很紧密的关联，特别是语文作为“百科之母”，学好语文具有基础性作用。只有将各课程间的关联性掌握好，融会贯通，传授给学生，就会让学生“知其然并知其所以然”。以人教版语文四年级上册的课文《观潮》为例，文中出现的“盐官镇”名称奇特，许多学生无法理解，大多老师也不会详细解释，其实可以通过史实延伸给学生交代背景，这就补充了历史知识；为什么会有“江湖”？内陆地区的学生可以不一定明白，老师又可以结合水文、地理等知识加以解读；近年来在一些观潮点出现了意外事件，那么老师又可以结合具体事例，进行生命安全教育。在传统蒙学教育中，识字、历史、自然、伦理等多方面的知识是融会贯通的，分科没有当代这么明显，从这个角度出发，本文提出要吸收传统蒙学教育中多学科知识有效衔接的特点，转化为当代语文教育的重要内容，从而进一步提升青少年儿童的综合素质、激发青少年儿童对语文的兴趣。

2. **提出蒙学读物主要是记载、反映与传承民众日常生活和文化的载体。**一些学者认为，蒙学所代表的“小学”与“大学”主要是年龄阶段的区分，在儿童阶段接受蒙学教育，随着年龄成长，接受“大学”教育研读圣贤经典。实际上，这个表面现象背后所蕴含的文化因素是：相对于名士圣贤经费而言，蒙学读物更接近于日常生活和文化，更容易被涉世未深的儿童所理解。陈来（2010）提出，中国文化的价值结构体系有两种：一是少数圣贤经典中记载的理想的价值体系，二是一般民众生活和日常行为所表现的实际价值取向，简单地说，也就是精英儒家伦理和世俗儒家伦理。世俗儒家伦理和精英儒家伦理不同，它主要不是通过儒学思想家的著作去陈述它，而是由

中下层儒者制定的童蒙读物形成并发生影响的。这种通俗儒家伦理读物的内容，在宋以后的中国历史上，在民众中流传极广，“在中国文化中，中下层儒者实施的蒙学教育才是伦理教化的直接活动”^[4]。徐梓（2017）提出，我国无以胜数的古代文献，大都是历代士人思想感情的表达，所谓的圣经贤传，不过是知识阶层思想感情的结晶。历代的儒林、文苑之士，他们在自己的著述中所表述的理想的价值体系，虽然不能说与广大民众日常生活中所表现的实际价值取向完全背离，但其中的确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因此，我们的文化史研究，如果总是以上层人士的著述和寓于其中的思想情感为中心，而不考虑此外有极其广大的民众的存在，不考虑民众实际的日常生活与士人的理想之间存在着很大的距离，就必然会造成盲人摸象的偏失。

3. 将传统蒙学与当代语文教育形成有效链接。毕苑（2006）研究了传统教材向新式教材的转型，即从蒙学读物发展为教科书的进程，其中具有标志性的主要是 1897 年南洋公学外院编《蒙学课本》、无锡三等学堂编《蒙学读本》，到三编文明书局的“蒙学教科书”，再到商务印书馆的“最新教科书”，标志着中国近代教科书的诞生^[5]。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多年来，中小学教育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实现了课程结构从“综合课程”到“学科课程”的嬗变。分科教学固然有利于教育更加精细化、专门化，但也要清醒地认识到，一些学科如算术、博物、物理、化学等，这些本来是从外国引进的学科，自然可以借鉴外国的课程理念与教材，甚至可以直接照搬，但语文学科是中国人自古以来就存在的学科，外国人对此的接触和研究显然不及中国人深，这种情况下借鉴外国的课程理念显然是行不通的，更不用说直接搬用外国教材了。从传统蒙学教育到当代语文教育，目前来说是存在着一个割裂或突变的状态，那么传统蒙学教育中究竟哪些是需要传承发展的，哪些是应该抛弃的，又如何与当代语文教育形成有效链接？都值得深入研究。

三、与本论文有关的国内外研究综述

（一）国内研究综述

郑振铎（1937）归纳了蒙学内容主要包括以下七方面：一是道德伦理和礼仪规范，二是初步识字扫盲教育，三是鼓励儿童读书进取，四是讲授启发儿童智慧的故事，五是介绍有关历史、地理以及博物的浅近常识，六是结合歌舞进行陶冶性情的文艺素养教育，七是有关性理大义之类^[6]。张志公（1991）依据教学内容侧重点的不同，梳理了蒙学教育过程的几个阶段：一是集中识字阶段，二是进一步的识字教育阶段，三是读写基础训练阶段，四是进一步的阅读训练和作文训练阶段^[7]。李良品（2004）提出，古代蒙学教材按内容侧重点的不同可分为综合、伦理道德、历史知识、诗歌、名物常识、工具书等六类；这些教材具有集中识字、整齐押韵、知识面宽、注重实用、重视思想教育等特点^[8]。结合中国教育部制定的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22 年版）中，以上这些教学内容，基本在当代义务教育语文课程目标中都有体现，义务教育语文课程培养的核心素养“文化自信、语言运用、思维能力、审美创造”，也基本通过以上教学内容实践来实现，这些古今相通的教学内容为蒙学教育教学方法的现代性转化提供了土壤。

如何吸收蒙学教育教学的长处，用于当代语文教学，也得到学界的高度重视。徐梓等（1991）认为，蒙学教育具有以下特点：一是在内容上，不光以识字和道德礼仪教育为主，涉及内容广泛，近似于百科全书；二是在语言上，注意儿童的心理特点，采用韵语形式，文字简练，通俗易懂，便于诵读和记忆，并力求将识字教育、基本知识教育和伦理道德教育有机地结合起来；三是在教学方法上，采用集中识字的教学方法，并且重视汉字的特点采取韵语体裁，或对偶句式，便于记诵；四是考虑了儿童的兴趣和特点，爱听故事，爱看图画，爱大声朗诵；五是注意与日用相联系，所出现的文字都是中国古代经典文献中常用字，教材内容贴进日常生活^[9]。张志公（1998）提出了发扬以蒙学为代表的传统语文教育优点、古为今用的建议：一是“双进合击”的语文教学思想与“注音识字，提前读写”的语文课改实验；二是“一条龙”的整体课程改革思路与志公版语文教材；三是重视知识教学与中学语法教学的两次改革；四是加强口语教学的设想与实践^[10]。沈立（2007）认为，“识字为先”是中国传统蒙学教学的首要原则，蒙学中主要有 3 种识字法：读诵法、字卡法与实物标字法^[11]。唐芳（2018）提出传统蒙学在当代识字教学中非常可行：一是符合儿童识字的心理认知机制，传统蒙学教材采用押韵或对仗等语言形式，趣味性、故事性强；二是巧妙运用汉字的特点，利于学生记诵；三是内容全面，识字量安排合理^[12]。张敬雅（2020）考察了清编唐诗蒙学范本 11 种，提出了对当代语文教材唐诗编选的启示：一是编者须立足课程标准、学生身心特点、政治经济文化水平等，选取适合主流价值教育和古典文化传承的内容；二是当代语文教材诗歌编选应富有典范性、教育性、思想性、多元性^[13]。张西平（2009）提出：“传教士的汉语学习从中国传统的蒙学识字开始，在梵蒂冈图书馆仍保留着他们当年学习汉字的《千字文》、《三字经》等课本。”^[14]“早期来华的西方传教士基本上是以中国传统的语文教学为主，他们学习汉字时大多采用《千字文》、《三字经》等中国蒙学课本。”^[15]李寅生（2001）指出，日本在大宝元年（701）颁布的《大宝律令》中，要求日本学校的教学内容以儒学经典为主，课程分为大经、中经、小经，《教经》《论语》也被指定为必读的教科书^[16]。

(二) 国外研究综述

1579 年，第一位进入中国也是第一位创作中文诗歌的来华耶稣会士意大利人罗明坚到澳门，借助蒙学教材学习中文，他从 1581 年就开始着手翻译《千字文》，并将译文寄回意大利。罗随后又翻译了《四书》，并通过对晚明蒙学、劝善文学、八股文的学习，还逐步掌握了格律诗的写作技巧，蒙学读物在罗明坚学习中文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17]。第一部《三字经》俄译手稿是布道团第二班学生罗索欣翻译的，时间大致在 1740 年。俄译《三字经》的第一个版本出版于 1779 年，译者是第三班随班学生阿列克谢·列昂季耶夫。自 19 世纪 30 年代起，《三字经》在俄罗斯整个社会层面广泛传播^[18]。

传统蒙学读物传入日本的数量比较多，因此日本学者对蒙学教育的研究较为丰富、较为集中。日本学者大庭修（1984）发现，江户时代（1603~1868）的中国商船带了多种版本的《三字经》《孝经》到日本：“西五番船特别交易《三字经》二百九十六部各一种。”^[19]“（宽政年间，即

1789 年之后) 卯三番船特别交易《沈志祖千字文》一部,《真草千字文》一部。”^{[11]P314} 据(日)石川松太郎《讲堂文库架藏往来物分类目录并解题》,永禄五年(1692)发刊的《广益书籍目录》,已经列有《三字经》和福建陈翰迅的《三字经注解》。日本学者鹤岛俊一郎(2004)提出所见到的江户时代在日本刻板印行的《三字经》就有 8 种之多。^[20]江户末期至明治初年,《三字经》在日本盛行并产生重大影响,日本《三字经》仿制本大量涌现,据日本教育学家片野英一考证,日本《三字经》仿制本约有 20 种,他认为“《三字经》关于儒教思想的解释简明易懂,其在道德教育的注入方面无疑是被作为最佳的读书教材之一而被使用的。”^[21](日)乙竹岩造于 1915 年至 1917 年对日本各地曾经担任寺子屋教师以及曾在寺子屋学习过的数百人进行了实地调查,发现《三字经》在日本各地均主要作为阅读材料使用,如关东、九州、中部地区等。^[22]许然(2009)提出,《三字经》从 16 世纪罗明坚的拉丁文译本,到日本江户时代在日本的广泛传播,再到 18 世纪初在俄语世界的翻译和传播,以及 19 世纪初进入英美法等国,产生了多种译本,特别是翟理思《三字经》译本着眼于如何学习汉语,更像是一本汉语教材。^[23]1990 年,《三字经》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选编入《儿童道德丛书》,向世界各地儿童推荐学习。外国人利用蒙学读物开始学习中文,主要就是由于蒙学读物浅显易懂,又具备集中识字、韵律和谐等特点。因此,蒙学读物在中文的域外传播和中外文化交流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以上成果都对蒙学经典的教育教学特点进行了提炼与总结,但是综合来看,现有的研究主要还是集中在蒙学的文化价值、伦理精神、教材特点等方面,对于如何吸收蒙学教育教法精华并进行现代性转化,尚存在研究空间。

四、总结内容

结合以上前人已有研究,本文认为,中国传统蒙学教育在近三千的发展历程中,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经验与教学方法,其中宜于进行现代性转化的教学方法,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方面:

(一) 在教材内容上,考虑到儿童对未知世界的探索,涉及内容广泛,贴近日常生活、易于儿童具体感知

1. 开阔儿童眼界,激发学习兴趣。蒙学教材在内容上,考虑到了儿童对未知世界的探索,涉及内容广泛,近似于百科全书,如天文地理、岁月节令、文事科名、饮食服饰、珍宝器用、文具武备、制作技艺、农桑水利、释道鬼神、鸟兽虫鱼等等,无所不有,而且这些内容大都贴进日常生活,实用性强。儿童在成长过程中,对所见所闻都非常好奇,就在儿童认识身边事物初期,即教会他表示该事物的文字,建立实物与口头语言和书面文字的链接,往往事半功倍,如清王筠《教童子语》载:“先取象形、指事之纯体教之。识‘日’‘月’字,即以天上日月告之,识‘上’‘下’字,即以在上在下之物告之,乃为切实。”为了在有限的篇幅内展示生活中常见事物用字,古人编纂了一系列内容丰富又简单易学的蒙学教材,如《千字文》包罗万象,文章虽仅有一千来字,却囊括了天文、地理、人伦、常识、历史、道德等知识,堪称儿童“小百科全书”。全文可分

四部分：第一部分从宇宙的诞生、开天辟地开始讲起，讲到日月星辰、气象物候、地球上的自然资源，一直讲到人类出现以后，中国太古和上古时期的历史，最后以人类社会的出现和王道政治作为结尾；第二部分重在讲述人的修养标准和原则；第三部分讲述与王朝统治有关的问题，叙述上层社会的豪华生活和他们的文治武功，最后描述了国家疆域的广阔和风景的秀美；第四部分主要描绘恬淡的民间田园生活，讲述君子治家处身之道。阅读它，能帮助孩子打开眼界，满足好奇心，激发求知欲，全面拓展文化、历史、自然等等知识。又如《幼学琼林》是一部关于中国古代文化的百科全书，它采用对偶的形式，介绍了天文地理、时令节气、教育科举、宗族宗教、衣食住行、制作技艺、花木鸟兽、婚丧嫁娶等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内容广博。

2. 培养日常生活中的礼仪教养。《朱子语类·卷七》提出，启蒙教育阶段“只是教之以事”，不过问“理”。这就是尊重了儿童多记性、少悟性的年龄特征。所谓的“事”，包括礼乐射御书数、孝悌忠信之德、洒扫应对进退，包括父子之亲、君臣之义、夫妇之别、朋友之交、长幼之序、心术之要、威仪之则、衣服之制和饮食之节等。归纳起来，就是儿童日常生活中的道德规矩。清李新庵《重订训学良规》载：“如认父母字，则教以如何孝顺；认兄弟字，则教以如何友悌。”就是提倡童蒙教育要与生活中的礼仪教养结合起来，让孩童有切身感知、知行合一。如《三字经》以“融四岁，能让梨。悌于长，宜先知”等，教导幼儿要懂得礼仪、孝顺父母、敬爱兄长。《礼记·曲礼》记载了在各种不同场合的礼仪规范，如到别人家里去做客的礼仪：“将适舍，求毋固。将上堂，声必扬。户外有二履，言闻则入，言不闻则不入。将入户，视必下，入户奉扃，视瞻毋回，户开亦开，户合亦合。有后入者，合而勿遂。毋践履，毋踏席，扞衣趋隅，必慎唯诺。”《弟子规》中“或饮食，或坐走，长者先，幼者后”，教导学生在日常生活中要懂得谦让和尊敬师长；“过能改，归于无。倘掩饰，增一辜”则教导儿童知错要改。这些都是日常生活中经常会遇到的事，不虚玄，不高妙，切于实用，也适合蒙童的理解能力，抓住了启蒙教育的根本。先是培养日常礼仪教养习惯，随着年龄成长，再逐渐深入到伦理道德教化，这样就不会显得生硬与突兀，便于学童理解与遵循，如宋朱熹《小学·嘉言》引杨亿的话说：“童稚之学，不止记诵。养其良知良能，当以先人之言为主。日记故事，不拘今古，必先以孝弟忠信、礼义廉耻等事，如黄香扇枕，陆绩怀桔，叔敖阴德，子路负米之类，只如俗说，便晓此道理，久久成熟，德性若自然矣。”

(二) 在教学语言上，考虑到儿童语言习得的规律，巧妙安排语音押韵与词语组合，建立语音词义的联想链接

1. 韵律和谐，易于诵读。蒙学教材是专门为儿童编写的，大多蒙学教材采用的都是韵文的形式，文字简单易认易读易记，符合儿童语文学习的特点。通过韵律能为上下文建立读音上的呼应，节奏鲜明、韵律和谐、朗朗上口的蒙学读物，能帮助儿童建立语感，培养孩子的韵律感。汉语的韵律主要体现在押韵、节奏和平仄等因素上，作为一种元音占优势的语言，“押韵”对儿童学习语言文字及文学有非常显著的优势，蒙学教材在内容上安排基本上各句押韵，儿童阅读起来，能建立上下各句间的呼应与链接，易诵读、理解、记忆。在节奏上，儿童发音器官还未完全发育成熟，

口头上朗读多重韵律的句子存在一定困难，语言理解能力还较低，思维上难以理解长句，婴儿语言习得从单音节词到双音节词再到多音节词就是个很好的证明，所以蒙学读物在节奏安排上宜简不宜繁。如《千字文》四字成句，二句一韵，全文共 250 句，所押的韵主要为阳部、耕部、职部和支部、药部和宵部四个。《三字经》全文 380 句，以三字为一句、二句一韵。《蒙求》摘取史传轶事编成四言韵语，两两对句，隔句押韵。这样的结构单位上下句之间节奏轻快、句式精炼，诵读起来犹如吟唱。**通过韵律和谐的诵读能激发儿童乐感，释放儿童天性，避免儿童厌学。**明代理学家王守仁在《训蒙教约》中说：“大抵童子之情，乐嬉游而惮拘检，如草木之始萌芽，舒畅之则条达，摧挠之则衰痿。今教童子，必使其趋向鼓舞，中心喜悦，则其进自不能已。故凡诱之歌诗者，非但发其志意而已，亦所以泄其跳号于歌诗，宣其幽抑结滞于音节也。异之习礼者，非但肃其成仪而已，亦所以周旋揖让，而动荡其血脉，拜起屈伸，而固其筋骸也。讽之读书者，非但开其知觉而已，亦所以沉潜反复而存其心，抑扬讽诵以宣其志也。”**和谐的韵律也能为儿童随后的阅读理解、属对和作文积累素材，筑牢根基。**荀子有云：“诵数以贯之。”朱熹注云：“荀子说，数诵以贯之，见得古人诵书，亦记遍数。乃知横渠教人读书必须成诵，真道学第一义”。将“诵”看作“真道学第一义”。如《千家诗》所录 122 家共 1281 首律诗和绝句，大多是唐宋时期的名家名篇，易学好懂，题材涉及山水田园、赠友送别、思乡怀人、吊古伤今、咏物题画、待宴应制，流传广泛，影响深远。如清代《历代国号总括歌》的开篇写道：“盘古首出传三皇，有巢燧人功难忘。五帝之说至不一，羲轩治迹犹微茫。”把上古时期的历史概括为四句话，合辙押韵，方便记忆，且在学习历史的同时培养儿童的对仗、作诗、作文能力。

2. 词义关联，便于识记。为易于集中识字，蒙学教材将单字巧妙地排列组合起来，让各单字在意义上建立联系，既便于理解、记忆，也能避免识字时的枯燥乏味。相传梁武帝萧衍一生戎马倥偬，他很希望自己的后代能在太平时期多读些书，由于当时尚没有一本适合的启蒙读物，令一位侍从从大书法家王羲之的手迹中拓下一千个各不相干的字，每个字一张纸。然后一字一字地教学，但杂乱难记，梁武帝寻思要将这一千字编撰成一篇文章。于是，他召来自己最信赖的文学侍从周兴嗣，讲了自己的想法。周兴嗣接受任务回到家后，苦思冥想了一整夜，终将这一千字联串成一篇内涵丰富的四言韵书《千字文》。顾炎武对此评价说：“读者苦《三苍》之难，便《千文》之易，于是至今为小学家恒用之书。”记忆的一种主要机能就是在有关经验中建立联系，思维中的联想越活跃，经验的联系就越牢固。美国著名记忆术专家哈利·洛雷因曾说：“记忆的基本法则是把新的信息联想于已知事物。”所以蒙学教材将单字组合成文就是通过建立联系而便于记忆。

(三) 在教材形式上，考虑到儿童从具体到抽象的认知特点，引经据典引入故事，增强趣味性，在正文中加入插图，既直观形象又吸引儿童兴趣

1. 引入故事，趣味性强。在载体形式上，考虑到了儿童学习由具体到抽象的年龄特点，许多蒙学教材引经据典，具有较强的故事性，儿童在探求故事情节时顺道识字学文，也愿意反复阅读。《三字经》中的典故或倡导尊敬师长，或鼓励勤奋学习，或赞扬清正廉洁，如在第一部分中，通

过例举孟母为了培养孟子曾三次搬家，以及窦燕山家教严格、教育有方，五个儿子均科举登第等历史故事，来说明教育的重要性；第六部分中，例举西汉路温舒、公孙弘即使家庭贫困无钱买书，也要自食其力、奋进苦读，以及东汉孙敬、战国苏秦刻苦学习的故事来鞭策幼儿勤奋刻苦学习。这些真实事例的引入，使书中的观点更具有说服力，同时幼儿本身善于模仿，优秀人物的事例能给幼儿提供榜样的作用，鼓励他们认真学习，生动的故事使抽象的劝诫变得形象、具体、通俗。

《千字文》几乎句句引经、字字用典，出典包括《易经》、《淮南子》、《诗经》、《尚书》、《礼记》、《春秋》、《论语》、《孝经》、《孟子》、《史记》、《神农本草经》、《管子》、《韩非子》、《庄子》、《汉书》等。《蒙求》是一本历代典故汇编集，全文共 636 句，除去末尾 4 句，包含古人事迹的有 632 句，取材涉及《左传》《论语》《孟子》《史记》《汉书》《三国志》《文选》《世说新语》等。《龙文鞭影》作为一本典故汇编集，全文共 1032 句，不包含典故的句子只有 4 句。《幼学琼林》中“儿童争日，如盘如汤；辨士论天，有头有足。”引用了孔子“两小儿辩日”典故。引经据典既可以故事吸引儿童，也可培养儿童其后在写作中为举例与归纳积累丰富素材，提升写作能力。

2. 善用插图，直观形象。图像在儿童认识世界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大部分低龄幼儿在还不会认字时，是通过视觉、听觉和触觉来认识这个世界的，生活中几乎所有的信息都是以图像的方式进入孩子的眼睛和大脑，但是儿童在生活中的经历与见闻是有限的，书中的图画能给儿童带来新的知识，拓宽对事物的认知。同时在识字书中加入插图，可以让儿童清楚地认识到日常生活中存在的具体“事物”，图画是孩子认识世界、了解世界的重要途径，也是儿童在学习书本知识过程中理解文字内容的重要辅助手段。此外，图画还可以培养儿童的想象力、创造力以及艺术鉴赏力，蒙学教材中的插图是打开想象力的钥匙，儿童通过插图来理解故事的内容，构建脑海中的画面感，看到教材中的精美插图，也会被图画所吸引，无形中提高自身的艺术鉴赏力。明朝时期，传统蒙学教材加入大量插图，使之更加生动活泼，在蒙学教育发展进程中起到了里程碑式作用，张志公（1977）认为我国图文对照的看图识字课本的出现，不晚于 13 世纪（比欧洲同类教科书的出现约早 400 年）。^[24]目前所见最早的儿童图画故事书有明正德十年（1515）刊印的《新刊明解图像小学日记故事》与嘉靖二十一年（1542）刊印的熊大木版《日记故事》等。《新编对相四言》是图文对照的识字课本，共 388 字 306 图。《蒙养图说》用白话解说故事，每个故事有一幅图。《养蒙图说》共 90 则，上半页绘图，下半页以浅近文言兼白话文说明其事，文以不过半页为限，意在启蒙。《养正图解》辑录周文王至宋代的传说典故，绘图 60 幅，每图后附解说。

（四）在教学顺序上，考虑到儿童由简入繁的思维发展规律，识写分开，先集中识字、简单习字，写作训练以属对为先、寓教于乐

1. 集中识字以会认为主。在整个蒙学教育时期，儿童逐渐从之前的生活中体验语言、模仿语言转为系统地学习接受语言的听说读写的教育。识字是学习文化的开始，是启蒙教育的必要手段，是儿童从运用口头语言过渡到学习书面语言最初的环节。汉字不属于表音文字，如果不认识一定数量的字是无法整句整段地阅读的。清人王筠在《教童子法》中所说：“蒙养之时，识字为先，不

必遽读书……能识二千字，乃可读书。”蒙学教育最开始是以集中识字为主要教学内容，在儿童入学前后用比较短的一段时间（一年上下）集中地教儿童认识一批字——两千左右。教材以《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弟子规》等为主，通过字、词的大量学习积累词汇量。这些字词又都是中国古代经典文献中的常用字和高频词，积累了大量词汇后对今后进一步的学习大有裨益。《千字文》全文 1000 字，只有一个“洁”字出现了两次。《三字经》全文 1140 字（按清朝道光年间刊行），其中只出现一次的字有 550 个。《百家姓》是集中姓氏为四言韵语的蒙学识字课本，共收单姓 444 个、复姓 60 个，总计 504 个姓氏。《弟子规》全文共 360 句，1080 个字。《三字经》中，对蒙学与下一阶段教育作出了明确要求，首先是蒙学“首孝弟，次见闻。知某数，识某文……凡训蒙，须讲究。详训话，明句读。为学者，必有初。小学终，至四书。”“为学者，必有初”就是指传统文化教育必须从蒙学开始，为下一阶段的学习奠定良好的基础。当然这些字的学习也不能一蹴而就，要遵循由简入繁的顺序，清人石天基《训蒙辑要》“课儿八法·认字”载：“如前一日教以‘一’字‘了’字，次日即以‘了’字加‘一’字，即夫子之‘子’，父子之‘子’，如此类推。字字认识，字字透解，是书未读而字已识认。”^[25]清王筠《教童子法》也提出：“先取象形、指事之纯体教之。识‘日’‘月’字，即以天上日月告之，识‘上’‘下’字，即以在上在下之物告之，乃为切实。纯体字即识，乃教以合体字。”

传统蒙学识字的方法主要有四种：读诵法、字卡法、标记法与辨字法。**读诵法**是由老师领读、学生跟读与指读，读到一定程度，学生就可以背诵这些文章，基本掌握其中汉字的字音与字形，达到识字的目的。因为这个年龄阶段的儿童思维能力与理解能力还没有充分发展，但是视听觉能力已经形成，对他们而言，读诵是一种扬长避短的学习方法。**字卡法**就是把汉字写在一张小纸片上来识字，以两三个汉字为一组，以五十个汉字为一个阶段。清崔学古在《幼训》中这样描述：“先截纸骨，方广一寸二分，将所读书中字，楷书纸骨上，纸背再书同音，如‘文’之与‘闻’、‘张’之与‘章’之类，一一识之。又遇姿敏者，择易讲字面粗粗解说。识后，用线穿之，每日温十字，或数十字，周而复始，至千字外，方用后法。教书读至上《论》，方去纸骨。大约识完《四书》，总字足矣。”**标记法**，清崔学古称之为“书上识字”：“凡教生书，先令本生，就书上字，逐字挨认，遇不识字，用朱笔圈出，又用黑笔写在书头，最为易记。”这种识字法就是贯彻了“因材施教”理念，对于新课文，儿童们各人所不认识的字并不会完全相同，各学童把不认识的字先选出来，用红笔和黑笔做好标记，老师再逐一讲解，这样各学童都弥补了自己的不足。待所有人都认全了，再行诵读。如清唐彪在《父师善诱法》中说：“凡教童蒙，清晨不可即上书，须先令认字。认不清切，须令再认，不必急急上书也。何也？凡书必令学生自己多读，然后能背。苟字不能认，虽欲读而不能，读且未能，乌能背也？”第四种方法是**辨字法**，就是将具有联系紧密的两字单独抽取出来，相互对照地学，以此来加深对其特点的记忆。清崔学古《幼训》载：“如‘形’之与‘刑’、‘扬’之与‘杨’，声同而笔画偏旁不同；如‘巳’之与‘已’、‘行’之与‘行’、‘焉’之与‘焉’、‘女’之与‘女’，字同而用之不同；又‘星’之与‘心’、‘登’之与‘敦’，声近而用舌用齿又不同。诸如此类，必细辨之。”这四种识字法的共同目的，就是使学生对每个汉字的字

音与字形都能够一一对应，通过教师的简单讲解，能够理解汉字的基本含义。

2. 习字从笔画简单入手。学习写字，安排在集中识字之后，清王筠《教童子法》载：“学字亦不可早。小儿手小骨弱，难教以拨镫法，八九岁不晚。”徐梓(1991)提出“传统蒙学教育中的学习写字，远比我们今天所想象的迟，童蒙学习写字，并不像今天的小学生一样，是与识字同时起步的。这不仅牵涉到纸墨笔砚一大堆复杂的书写工具问题，而且古人的写字，从一开始就是一项书法艺术的训练。”^{[4]16}学习写字的内容，又与“三百千”有所不同，初期主要是描摹笔画简单的字，就是这些用以学习写字的字，古人也会组合起来编成三言韵文，如“上大人，孔乙己，化三千，七十士，尔小生，八九子，佳作仁，可知礼。”以上24字自唐已用于蒙童习字，北宋僧人道原《传灯录》载：“或问陈尊宿，如何是一代时教？陈曰：‘上大人孔乙己’。”陈尊宿是唐代高僧，由此可知唐代已用“上大人孔乙己”等习字。宋普济《五灯会元》载：“郭功甫谒白云，云曰：‘夜来枕上作《山颂》，谢功甫大儒乃曰：‘上大人，孔乙己，化三千，七十士，尔小生，八九子，佳作仁，可知礼’也。”元方回诗云：“忽到古稀年七十，犹思上大化三千。”说到了古稀之年，还回忆童年习字的往事。清初褚人获《坚瓠集》载：“小儿习字，必令书‘上大人，孔乙己，化三千，七十士，尔小生，八九子，佳作仁，可知礼。’天下同然，不知何起。”

写字训练主要是模仿，大体分描、摹、临几个步骤。描是描红，也叫“润朱”，明代佚名《教子良规》载：“今之开蒙者，必先把笔润朱，令其笔画撇竖，一一如法不爽，而后作书法，以令其印证，此是常则。”可见这种训练主要是为了让学童学会点画撇竖各种笔画，掌握用笔的方法。摹是影写，影写时以透明的薄纸蒙在字帖上，把字一个个描写下来。有的学塾影写《九成宫碑》，有的影写《千字文》。临是临帖，宋人张世南《游宦记闻》载：“今人皆谓临摹为一体，不知临之与摹迥然不同。临谓置纸在旁，观其大小、浓淡、形式而学之，若临渊之临。摹谓以薄纸覆上，随其曲折婉转用笔曰摹。”李新庵《重订训学良规》梳理了儿童习字的进程：“初学仿本，宜方寸大。稍长，则用空格仿本影写，一字自写一字。十三四岁，每日临帖一纸，小楷一纸。临帖以《玄秘塔》《皇甫碑》为入手，须寸半大。十七八岁，隔数日写字一日，能不停笔写至三千以上，则既工且速，入试不占作文功夫矣。”不论是描，还是摹、临，都是一种模仿学习，模仿在今日仍是一种重要的习字方法。习字教学的原则也有三个，一是“口授不如手教”，习字是操作性很强的实践，教师比较重视手把手指导和传授习字方法，对初学写字的学童要“把腕”，教师手把手地教，使学童体会到运笔的轻重快慢，崔学古《幼训》载：“蒙童无知，与讲笔法，懵然未解。口教不如手教，轻重转折粗细具体，方脱手自然。”二是宜先大后小，通过大字来掌握字体结构框架，清王筠《教童子法》载：“不可學小字。大有三分好，縮小，便五分好也。”清崔学古《幼训·临仿本》载：“字须方广一寸五分，最忌临小字，致他年有拘促之病。大字稍成，然后于大字下，分列两行小字临之。”三是宜先慢后快，学童初入学塾习字，只可写两字，不得过多。两字端正，方可换字。若贪字多，便很难成就。清人陆世仪在《论小学》中说，练到一定程度，“每版影写十纸，既毕后，歇读书一二月，以全日之力，通影写一千五百字，添至二千、三千、四千字，如此一二月乃止。必如此方能后日写多，运笔如飞，不至走样，亦是一法。”先慢慢地写端正，再提高速度。

3. **作文教学以属对训练为先。**作文教学在蒙学教育阶段，首先也是训练基本功，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句式训练中的属对。唐元稹《叙诗寄乐天书》载：“声势沿顺，属对稳切者为律诗。”清王筠《教童子法》载：“读书一两年，即教以属对。初两字，三四月后三字，渐而加至四字，再至五字，便成一句诗矣。”“凡每日属对，必相其本日所读，有可对者，而后出之，可验其敏钝；即或忘之，亦教责之而无词也。”清塾师一般都重视对课训练，适时给学生布置对课作业。清石天基《训蒙辑要·学堂条规》载：“傍午看所讲之书，小学生能属对，即出对给他对。”至于属对训练的步骤与方法，清崔学古《幼训》归纳为四种：“一曰训字。先取《对类》中要用字眼，训明意义。戒本生勿轻翻对谱，须先立意，方以训明字凑成。勿轻改，勿轻代作。一曰立程。语云：‘读得古诗千百首，不会吟诗也会吟。’学举业者，必多读先正文名，以为楷模。何童子作对，而止以刻成死字相绳耶？须多选古今名对，如诗话者，细讲熟玩，方可教习。一曰增字。假如出一‘虎’字，对以‘龙’；‘虎’字上增一‘猛’字，对亦增一字，曰‘神龙’；‘猛’字上再增一‘降’字，对亦增一字，曰‘拳神龙’；‘降’字上再增一‘威’字，对亦增一字，曰‘术拳神龙’；‘威’字上再增一‘奇’字，对亦增一字，曰‘异术拳神龙’，从此类推，自一字可增至数字，为通文理捷径。一曰句眼。古人以‘轻风柳絮’‘明月梨花’二句，令人补一字，推敲再四，如‘吹’、如‘飘’等字，俱未妥，惟用‘扶’‘失’字，方足为‘轻’字、‘明’字传神。从此类推，有眼在首尾者，有眼在中间者，不能尽举。”“训字”指训诂字义，了解文字的本来意义；“立程”，指确立学习摹仿的经典；“增字”，指从一字对过渡到多字对，由易到难；“句眼”指讲究炼字，辨析语言。总体来看，古人开展童蒙属对教育，还是结合孩童天性，采取游戏性的训练，寓教于乐，激发儿童兴趣，激活儿童利用日常所见所闻进行属对的灵感，这比抽象高深的理论教学显然更适合儿童。在教材选择上，宋汪洙《神童诗》、刘克庄《千家诗》，明初佚名《对类》，清代李渔《笠翁对韵》、车万育《声律启蒙》、孙洙《唐诗三百首》等都明确地强调对仗。在属对的训练中，从一字对到五字对，就相当于完成了一联对仗的五言诗句，在此基础上再进行诗歌训练，然后再过渡到作文训练，这样教与学都进展得比较自然，也比较顺利。

结论：

综上所述，中国传统蒙学教育的基本目标在于培养儿童认字和初步书写与属对的能力、养成良好的日常生活习惯、能够具备基本的道德伦理规范，并掌握一些中国基本文化知识及日常生活的常识。从教育发展理论来看，儿童的认知系统是通过不断的学习、练习以及增加社会性的经验而发展完善的，有其内在的规律性和系统性，循序渐进、因材施教才能适应儿童的认知发展规律。

五、研究结果

当然，受当时政治统治和科举应试的需要，以及编著者眼界学识有限等制约，蒙学教育及教材在思想上存在一部分鼓吹封建伦理的糟粕，如教育最终目的是为了参加科举考试而作官、编纂了《曹大家女诫》《女论语》《内训》《闺苑》等“教女”类教材、在教学方法上也存在死记硬背与



八股文式写作等不适应当代教育的成分等，这些都是要坚决摒弃的。正是由于传统蒙学教育在教学方法上具有贴近日常、易于感知，韵律和谐、易于诵读，词义关联、便于识记，引入故事、趣味性强，善用插图、直观形象，集中识字、减轻负担，简单习字、属对为先等特点，尊重学童成长实际与认知规律，因此也在中国教育史上流传了数千年，为中华文明传承奠定了坚实基础。也正是如此，对传统蒙学教育教学方法进行现代性转化，也具有了完备的理论逻辑。当代语文教育非常有必要吸收传统蒙学教育中教学方法的精华，并进行现代性转化，转化为当代语文教育的重要方法与技巧，为传承与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动当代语文教育繁荣与振兴、培育堪当大任的新时代人才作出应有贡献。

(备注：本文为蒋尊国博士学位论文的一部分。)

参考文献

- 瞿菊农. 中国古代蒙养学教材. [J].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 1961. (04): 45-56
- 徐梓. 传统蒙学与传统文化. [J]. 寻根, 2007. (2): 12-15
- 河边. 漫谈蒙学. [J]. 中国考试(研究版). 2007. (2): 53-57
- 陈来. 蒙学与儒家世俗伦理. 中国近世思想研究. [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0. 478.
- 毕苑. 从蒙学教科书到最新教科书——中国近代教科书的诞生. [J]. 山西师大学报(社科版), 2006. (02): 94-98.
- 郑振铎. 中国儿童读物的分析. [J]. 文学(儿童文学特辑). 1937. (1). 转引自乔卫平、程培杰. 中国古代幼儿教育史. [M]. 合肥: 安徽教育出版社. 1989. 166-167
- 张志公. 传统语文教学研究. [M]. 广州: 广东教育出版社. 1991. 1-2
- 李良品. 试论古代蒙学教材的类型、特点及教育功能. [J]. 甘肃社会科学. 2004. (3): 84-86
- 徐梓, 王雪梅编. 蒙学须知. [M]. 太原: 山西教育出版社. 1991. 6
- 张志公. 张志公自选集(第1卷).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453
- 沈立. 浅论如何在中小学推行传统文化教育. [J]. 中国教育学刊. 2007. (5): 24-27
- 唐芳. 略论传统蒙学教材在识字教学中的应用. [J]. 语文建设. 2018. (21): 65-67
- 张敬雅. 清编唐诗蒙学范本研究及当代启示. [J]. 语文建设. 2020. (10): 66-70
- 张西平主编. 世界汉语教育史.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9
- 张西平. 欧洲早期汉学史——中西文化交流与西方汉学的兴起. [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9. 49-53
- 李寅生. 论唐代文化对日本文化的影响. [M]. 成都: 巴蜀书社. 2001. 189
- 陈恩维. 来华耶稣会士罗明坚与中西文学的首次邂逅. [J]. 文学遗产. 2022. (01): 89-103.
- 朱仁夫. 中国儒学在俄罗斯——献给中俄文化年. [J]. 东方论坛(青岛大学学报). 2006. (03): 1-9.
- (日)大庭修. 江户时代中国典籍流播日本之研究(戚印平, 王勇, 王宝平译). [M]. 杭州: 杭州大

学出版社. 1998. 105. (日文原著出版于 1984 年)

(日) 鹤岛俊一郎, 董明. 《三字经》在日本的流传和日本的《本朝三字经》. [J].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4. (04): 123-125.

(日) 片野英一. 关于东亚地区《三字经》之普及状况的考察. [J]. 日本的教育史学. 2002. (45): 189

(日) 乙竹岩造. 日本教育史研究. [M]. 东京: 目黑书店. 1935. 485

许然, 卢莉. 略论《三字经》在海内外的传播. [J]. 天中学刊. 2009. (3): 128-130

张志公. 《新编对相四言》的来龙去脉. 传统语文教学研究. [M]. 广州: 广东教育出版社. 1991. 186.

徐梓, 王雪梅编. 蒙学要义. [M]. 太原: 山西教育出版社. 1991. 136

Author (1) Information (第一作者信息)

| | |
|--|--|
|  | Name and Surname (姓名): JIANG ZUNGUO |
| | Highest Education (最高学历): Doctoral Candidate |
| | University or Agency (任职院校或单位): College of Chinese Studies, Huachiew Chalermprakiet University |
| | Field of Expertise (专业领域): International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
| | Address (地址): 18/18 Bangna-Trad, Bangplee District, Samutprakarn, Thailand. 10540 |

Author (2) Information (第二作者信息)

| | |
|---|--|
|  | Name and Surname (姓名): CHEN ENWEI |
| | Highest Education (最高学历): Doctoral Degree |
| | University or Agency (任职院校或单位): Professor in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P.R.China |
| | Field of Expertise (专业领域): Chinese |
| | Address (地址): 2 Baiyun Avenue, Baiyun District, Guangzhou City, Guangdong Province, China. 510420 |

